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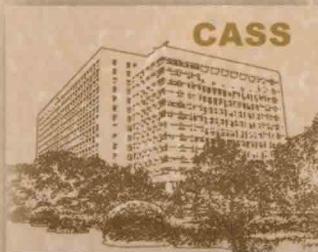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学者文库

阿尔泰语言学译文集

Translated Essays on Altaic Linguistics

陈伟/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阿尔泰语言学译文集/陈伟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学者文库)

ISBN 978-7-5097-2195-7

I. ①阿… II. ①陈… III. ①阿尔泰语系—语言学—译文—文集 IV. ①H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55363 号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学者文库 ·
阿尔泰语言学译文集

编 者 / 陈 伟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 政 编 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 任 部 门 / 人文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215

电 子 信 箱 / renwen@ssap.cn

项 目 经 球 / 宋月华

责 任 编 辑 / 孙以年 周志静

责 任 校 对 / 王 鹏

责 任 印 制 / 岳 阳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 者 服 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排 版 / 北京亿方合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19.25

字 数 / 378 千字

版 次 /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2195-7

定 价 / 88.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言

国内外学术界一般认为阿尔泰语系语言包含三个语族，即：蒙古语族、突厥语族、满通语族。这三个语族的分布范围总的来看，从日本海一直到地中海，横跨欧亚大陆。从我国情况看，它分布在西北、华北、东北的三北地区。因而，阿尔泰学既是国际性的学问，又是和我国三北地区各民族的语言历史文化直接有关的学问。

阿尔泰学的研究从北欧一些国家开始至今已有 200 多年的历史。在 20 世纪前半期，阿尔泰语言学作为一门真正意义上的学科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与此同时，不同观点的对立也明朗化。这些不同观点大致上有三种。第一种观点认为阿尔泰语系各语族有同源关系，因而主张构拟原始阿尔泰语形式。这样主张的学者，尤其是其中的奠基人和进一步开拓的人，都是经过长期用心研究有关语言的学者，并有杰出的著作问世。第二种观点认为阿尔泰语系诸语言的亲属关系还是一种假设，是否真有亲属关系，还须通过深入细致的研究来证实。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也都有不同程度的研究，他们的怀疑程度也都有些不同。第三种观点认为阿尔泰诸语言的关系，完全是互相接触、借用的关系。其中的个别学者甚至说，主张同源关系的学者们的“比较研究”是“徒劳无益”的，最好早点结束这桩纠缠不清的“公案”。

我们如果不带成见地客观地观察问题，会发现第三种观点有许多漏洞。迄今经过阿尔泰语言研究者们的努力，已经发现阿尔泰诸语言之间有大量的共同成分，这些共同成分不能简单地一笔抹杀。因为其中的许多成分涉及公元 7、8 世纪以前的语言史，有的甚至涉及公元 4、5 世纪的语言史。这就值得我们重视和细心地研究。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可以举个例子。蒙古语族把“石头”大致叫做“čulū”，突厥语族大致叫做“taš”，这两个语族的叫法从外表上看没有任何共同点。但是根据阿尔泰语言学家们的研究，这两个词是阿尔泰语言中的同源词，并且是经过历史语音学的考证的。理由是蒙古语族的čulū的上溯形式是čila-yun（书面语反映的古代形式）< * tyla-wun（更古的形式，wun 为构词后缀），而突厥语族 taš 的上溯形式为 taš < * tāl² < * tāl²a（突厥语中的一种，l，即 l²），突厥语音史中与 š 对应的形式（参见 N. 鲍培《阿尔泰语比较语法》）。

进行有关阿尔泰语言研究的人，不论研究蒙古语族语言，或突厥语族语言、满通语族语言，一旦涉及古代历史，都离不开阿尔泰语言学的知识和研究成果。在这个问题上，突厥学家科诺诺夫在 20 世纪 70 年代写的《苏联现代突厥语言学总结和问题》一文中说得好：“如果只利用突厥语言材料，实际上不可能勾画出公元 7 世纪以前的突厥语言情况；7 世纪以来，语音和语法结构变化很小，以致只根据上述材料不可能重拟突厥语言的源语模式，甚至连最初的工作假设也无法建立。所以，能指出用来顺利解决编写突厥语历史比较语法这一基础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把研究者引到突厥语系范围以外。只有在阿尔泰系语言材料的基础上才有可能着手重拟突厥语言的语音和语法。……没有诸蒙古语言和通古斯满洲语言的历史比较语法，将会使完成阿尔泰语言学的这一最重要的任务更加困难……”上述这段话的精神，反过来对蒙古语族、满通语族来说，也完全适用。它们也很需要突厥语族语言的研究成果，尤其需要历史比较语法方面的研究成果。

中国的阿尔泰语言研究中，对一些主要语言所进行的个别研究（尤其在辞书的编撰方面）都有较长的历史。但是对各个语言的历史研究，尤其与有关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则起步较晚。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全国少数民族语言调查以后，阿尔泰语系各个语族内部的比较研究逐渐开始。到 80 年代初，国家在“六五”计划中提出了开展阿尔泰语系研究的问题。从那时起，有关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逐渐开展了阿尔泰语系的研究。在一些学位论文中，有的对蒙古语族与满通语族进行了比较研究，有的对蒙古语族与突厥语族进行了比较研究，也有对整个阿尔泰语系的关系进行探讨的。这些学位论文，有的经过修订后，已经以专著的形式出版。

阿尔泰学历来是一门国际性的学科，它是由许多国家的著名学者所开拓的，研究著作涉及许多语种。对广大的读者和有关的一些研究工作者来说，把其中一些重要的论著进行翻译出版，无疑是很有帮助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陈伟、沈成明等同志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艰苦工作，作出了具有学术价值的贡献。他们的大量翻译著作中，包括阿尔泰语言学的奠基人、在阿尔泰语言学界享有很高声誉的芬兰学者 G. J. 兰司铁的名著《阿尔泰语言学导论》（形态学），前苏联的著名蒙古学家（蒙古语比较语法的奠基人）、阿尔泰学家 Б. Я. 符拉基米尔佐夫的《蒙古书面语与喀尔喀方言比较语法》，前苏联的著名蒙古学家 Г. Д. 桑席耶夫的《蒙古语比较语法》，以及陈伟同志与其他人合译的前苏联著名突厥学者 H. A. 巴斯卡科夫的《阿尔泰语系语言及其研究》等著作。

这次出版的《阿尔泰语言学译文集》中所包含的论文也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这里面包括了前苏联著名满通学家 В. И. 清其乌斯等人的重要著作。这对全面了解阿尔泰语系各语族语言的相互关系很有益处。过去，其中有的文章的译文曾在内部刊物上零散地发表过，有的只供内部参考，没有公开发表。这次把它们汇集成册出版，对于广大读者、对于关注这门学科的有关研究工作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我祝愿这次的出版工作顺利完成！

清格尔泰

2009年4月1日

目 录

CONTENTS

序 言 清格尔泰 / 1

阿尔泰诸语言的比较词汇学问题

..... [苏] B. И. 清其乌斯 著 陈伟 译 / 1

阿尔泰语言比较词汇学的任务

..... [苏] B. И. 清其乌斯 著 陈伟 周建奇 译 / 13

论阿尔泰诸语言中亲属关系用语的词源研究

..... [苏] B. И. 清其乌斯 著 周建奇 陈伟 译 / 26

阿尔泰诸语言的亲属称谓及其词源问题

..... [苏] B. И. 清其乌斯 著 陈伟 周建奇 译 / 83

蒙古语的元音系统和阿尔泰假说

..... [苏] Ч. Л. 麦尔尼科夫 著 陈伟 周建奇 译 / 95

论阿富汗境内蒙古语族和突厥语族的语言及方言

..... [匈] Л. 李盖提 著 陈伟 译 / 109

论阿尔泰诸语言的亲缘关系问题及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

..... [苏] H. 安德列耶夫 O. 苏尼克 著 陈伟 译 / 130

论蒙古诸语言中长元音的音位变体

..... [苏] Г. Д. 桑席耶夫 著 陈伟 译 / 147

论满通古斯语、蒙古语和突厥语中“火灶—住宅—民族”

这个词汇组合体的特征

..... [苏] O. A. 康斯坦丁诺娃 著 陈伟 周建奇 译 / 164

关于满通古斯语中“狗”这个名称的词源

..... [苏] K. A. 诺维科娃 著 陈伟 周建奇 译 / 177

论突厥—蒙古语言的共同性问题

..... [苏] C. K. 凯涅兹巴耶夫 著 陈伟 译 / 194

阿尔泰诸语言中词的内部构拟和词源学

..... [苏] T. A. 别尔塔加耶夫 著 周建奇 陈伟 译 / 203

关于阿尔泰诸语言中身体各部位的名称

..... [苏] B. Д. 科列斯尼科娃 著 周建奇 陈伟 译 / 223

谈谈阿尔泰语系的词类问题

..... [苏] Г. Д. 桑席耶夫 著 陈伟 译 / 273

阿尔泰诸语言的比较词汇学问题

[苏] B. И. 清其乌斯 著 陈伟 译

从现有的比较语音学和比较语法学的研究成果来看，现在已有足够的根据可以把突厥、蒙古、满通古斯和朝鲜^①这四个语族或语系列为阿尔泰语言。但同时也应当注意到：上述各个语族虽然作为近支亲属语言或公认存在亲缘关系的例证，像是具有内涵一致而自成体系的特性，然而它们相互之间却仍然存在着相当明显的界限。而且骤然看去，这种独特性还遍及语言学的各个方面，既包括语音，又包括语法以及词汇。因此，如果我们将阿尔泰诸语言发生学上的共同性问题感兴趣的话，我们就应当时刻记住，无论是这个问题的提出或是解决都必须先有一个全面看问题和处理问题的立场，即经常考虑到反映在语言学各个层面——语音、形态和词汇——上

① 关于把朝鲜语纳入阿尔泰“三段论”的问题，早在四十多年前，著名的苏联语言学家 E. Д. 波利万诺夫就已提出来了，并且，顺便说一下，他对当时阿尔泰学的科研著作评价是很高的：“‘由于阿尔泰诸语言’（即突厥语言、蒙古语言和满通古斯语言）比较语法已经取代了鲍勒、格隆策尔和温克勒等人的已丧失其可信性准则的‘乌拉尔阿尔泰’假说，现在——在兰司铁、符拉基米尔佐夫，尤其是波普的著作问世之后，‘阿尔泰诸语言’比较语法已走出了准备基础的摸索阶段，从而成为一门完全合乎科学的比较学科……同时，‘阿尔泰学者’们运用比较进行研究的工作方法，对于其他一切将成为比较语法的科研著作来说也可以作为必需的样板而予以推荐。”（Е. Д. Поливанов, К вопросу о родственных отношениях Корейского И《алтайских》 Языков 《关于朝鲜语与“阿尔泰”诸语言的亲缘关系问题》，载《科学院通报》第6集，第21卷，1927，No. 15—17，第1195~1204页）这使我们想起，那时兰司铁的两部十分重要的阿尔泰学著作问世了，即：G. J. Ramstedt, 1) Ein anlautender stimmloser Labial in der mongolisch-türkischen Ursprache 《蒙古—突厥原始语中的一个词首清唇音》，《芬兰—乌戈尔学会杂志》1916年第32期；2) Zur Frage nach der Stellung des Tschuwassischen 《有关楚瓦什语的地位问题》，《芬兰—乌戈尔语杂志》1922年第38期。较晚一些问世的是符拉基米尔佐夫的著作：Владимирцов. Грамматика 《语法》。现在，我们已有了内容结构广泛的阿尔泰学历史比较著作：Ramstedt, Lautlehre 《语音学》；Рамстедт, Морфология 《形态学》；Poppe, 1) Lautlehre 《语音学》；2) Altaic Linguistics 《阿尔泰语言学》。

的语言事实；其实在任何有发生学上亲缘关系的语系里作历史比较研究时，都是必须遵守这些条件的。

至于词汇材料，则迄今为止它在共同阿尔泰学方面主要是在上述四个语族中用于确定某些在这一或那一方面相适应词之间的基本语音对应关系，正如同为了揭示在起源顺序上的可能存在的相互关系而通常在初级阶段时所做的那样。正是适用这种方法，阿尔泰学才得到并使用了在共同阿尔泰语或源语层次上进行历史比较构拟的可借以依托的音位图。^①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在进行历史比较性质的研究时，绝不能对这些资料的存在置之不理，对它们必须要加以考虑，并且在批判地利用这些材料时，使之更加准确和丰富；最后，已经确定下来的语音构拟，不仅可用于阿尔泰学历史比较研究的语音方面，而且还可用于形态学和词汇方面。

因此，我们认为，在阿尔泰语系（由上述四个语族所组成）的发生学共同性问题的道路上已经有了一些稳固确立的路标，可以作为深入研究这些语言形成和发展历史，深入其语音、形态学和词汇结构的可靠指针。但是，仍然应该承认，在许多情况下，从起始就无争议的资料是为数极其有限的，特别在涉及突厥语与蒙古语、满通古斯语的关系时更是如此，至于朝鲜语就更不用说了。所以，我们认为，为了检验和证实阿尔泰学所取得的成果，以及为了发现阿尔泰诸语言在整体上具有发生学共同性的补充证据，就必须拓展事实材料的范围并加强和深化材料的分析方法。

按照广义的类属题项来统观阿尔泰系语言的全部词汇，是一种最有效的挑选新的并行词汇成分（因而，同时也是语音的和形态的并行成分）的方法。

由于我们将会遇到一些极为复杂的、多方面的历史语音对应现象，因而这种研究就更有必要了。在分析中引用一些远支亲属语族的材料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被比较词的词义相似情况不具有直线性的一致性（这对于近亲语言来说，是甚为常见的），那么机会就可能被研究者错过。

可以举下面的一个带有构拟为 *h'ap(a) — [n'är(a)-] 的原始词根形式的词作为其相互的语音关系被语义歧异弄得相当复杂的例词。这一原始词根形式的原义大概与某种“不久前、初次出现的一刚诞生的一幼小的一新鲜的一细嫩的一春天的一绿的”这样的概念有关。对于具有上述词根 h'ap(a)-

^① 见本书第1页注①所列兰司铁和波普的著作。

的词，无论是在蒙古诸语言中，还是在突厥诸语言中都有过仔细的研究。然而，在这两个语族中，无论就其语音面貌或是就其含义而言，这种词似乎都被显示为一组与外界隔绝的词。实际上，蒙古语中的一些形式就同上述的原始型相近，试比较：蒙古书面语 *nirai* < *n'ārai,^① 蒙古语 *нъярай*，布里亚特语 *нарај*，卡尔梅克语 *nirā ~ nirā* “刚刚，不久前诞生的”（指婴儿、幼畜），“幼小的”，“新鲜的”，“细嫩的”（指绿草、绿叶等）；蒙古书面语 *niraixan*，蒙古语 *нъярайхан*，布里亚特语 *нарайхан*（指小）“新生的”；蒙古书面语 *niraila-*，蒙古语 *нъярайла-*，布里亚特语 *нарайл* (a) “生长出来，分娩”。

在满通古斯诸语言里以及雅库特语中，这些词是作为借词出现的，试比较：满语 *н'ара-хүн ~ н'ар-хүн*（带有动形词的附加成分？）“新的”，“新鲜的”，“初次使用的”（主要指吃的东西），“新鲜的青草，绿叶”，“太年轻的”（即“幼稚地”），*н'ар-хү-кән*（指小）“相当新鲜的”“相当新的”，*н'архү-ла-*（指不久前）“出生，分娩”，*н'архүуа* “驼鹿仔”，“小驼鹿”。如果说，满语借词来源于蒙古语，那么这种借入却是通过雅库特语进入埃文基语东部诸土语的，尽管在雅库特语中这一借词仍旧还是蒙古语词^②，试比较：东部埃文基语 *н'ирај ~ н'ирэй, н'ирај - кāн*（指小）“新生的”，“婴儿”，“小孩子”，*н'ирај-ла-, н'ирајиң-* “生、分娩”，*н'ирајкāм-* “受到娇养，爱抚”（指婴儿），“调皮捣蛋”；雅库特语 *н'ыраі ~ н'ірәі ~ нірәі* “新生的”，“婴孩”，“刚生下来的”（指牲畜），“牛犊”，“幼小的”（指草），“浅短的”（指脑后和额上的头发），*н'ыра-мсii- ~ н'ірә-мсii-* “认为幼稚”，“受到娇养”。

而在对突厥语的形式进行研究时，通常都是引用一个有趣的、在语音方面又是多种多样的，具有“春天”～“夏天”含义的名词，试比较：古突厥语 *jaz*，鞑靼语 *яз*，巴什基尔语 *яз*，土库曼语 *яз*，乌兹别克语 *йоз*，哈萨克语 *жāз*，阿尔泰语 *дъас*，图瓦语 *ҹас*，雅库特语 *cāc*，楚瓦什语 *c'yp ~ c'op* “春天”//土耳其语 *yaz* “夏天”。

在这种情况下，为突厥诸语言所确定的原始形式是 *jāp（土库曼语和雅库特语还保留有长元音 ā），然而这一形式本身却是起源于阿尔泰语的原始型 *n'āp (a)。因此，对这一简略的单音节词，从其语音面貌的发展过程来

^① 这一原始形式的构拟见波普著《语音学》，第 38、81、97、154、156 等页。

^② Кахизыński: 《蒙古语成分》，第 22、26 页。

看，每个历史比较语言学家都必须“利用”，或更确切些说，逐个逐个地“勘正”其中的每一个音。问题在于，蒙古语方面在词首同时有两个鼻辅音—*н* (*n*) 和 *н'* (*n'*) ——并且还出现了 *i* 以代替元音 *ā* 的情况（试比较蒙古书面语 *nirai* < *n'ārai>），而在突厥语方面，在原始突厥语的词首“j化”中，可以看出是五个辅音 (*j*, *н*, *н'*, *д*, *չ*) 的并合，而且这个次生的共同突厥语的 *'j*-在突厥语的各个不同语言中已发展成 *j*, *չ*, *ж*, *ҹ*, *с*, *ҹ'*。因此，正如阿尔泰学历史比较语言学者所认为的那样，从突厥语的内部不可能证明在什么情况下现代各个突厥语言中的词首 *j*, *չ*, *ж*, *ҹ*, *с*, *ҹ'* 等是来源于共同突厥语的 *'j*, *'չ*, *'ж*, *'ҹ* 或 *'н* 或 *'н'* 的。这一问题的答案，只有借助于用所需要的突厥语词与蒙古语或满通古斯语的对应词进行比较才能取得。^① 在我们所分析的共同突厥语的原始构拟形式 **üap* > **üāz* > *üaz* 的例子中，除此之外，还碰到一个 *p* 音化—*z* 音化的问题，而且在这一具体情况下，不仅楚瓦什语或蒙古语的 **н'āpa*，而且匈牙利语的 *nyár* “夏天” < 布加尔语 *har* > 楚瓦什语 *c'op* ~ *c'yp*^②，以及朝鲜语的 **њьерым* (ёрым) “夏天”^③ 都有利于证明辅音 *p* 的原始性，即 *p* > *z* 的发展过程。

尽管比较语音学的结论已极其精细，但为了让被确定下来的原始类型的正确性更能令人信服，就还需要有语义和形态学方面的补充论据。我们认为，在这方面能够给我们提供所必需的起始资料的首先是对词汇进行的分门别类的分析。这种初步分析，在借助于内部和外部构拟的方法予以实施的时候，可以使我们发现一套固定的语义和形态学模式，而这些模式也如同我们在阿尔泰诸语言的一些材料中所看到的那样，都具有大体稳定的性质。用这种方法确定下来的这些模式同时也给研究者提供一些发现同源词汇单位的新的可能性。因此，应当说，尽管各语言的词库中某些构词情况有其特殊性质，但完全可能探索到词汇语义发展过程的某些规律性。

不要忘记，甚至比较语言学的鼻祖，即自波普最初几部比较语言学的著作问世之日起迄今已有 135 年以上历史的印欧语言学，即使在这一领域内，不久以前所出现的波折情况就正是在词汇学方面发生的。为了表明这一说法并非毫无根据，现在让我们看看苏联最知名的印欧语历史比较语言学者们在这方面的一些论述：

“相当多的历史比较研究著作，首先是印欧语比较语法方面的综合性著

① 见波普著《语音学》，第 27、154 页。

② 见里亚夏宁著《材料》，第 25 页。

③ 见波利万诺夫著《关于朝鲜语与“阿尔泰”诸语言的亲缘关系问题》。

作，其内容的狭隘性和局限性，也表现在对语言的各个方面进行历史比较分析所包括范围的不平衡上。

“实际上历史比较语法著作只包括对亲属语言的语音和形态学的研究。专门研究词源学的著作甚少。至于广义上的历史比较词汇学，特别是历史比较句法，这些问题几乎还没有被研究过。”^①

再一次强调指出下述尾部不会是多余的，即阿尔泰学作为一门历史比较学科较之印欧学要年轻整整一百年，这并不是就已经确定的一些语音、词汇、形态学或句法的个别并行现象来说，而是首先指作为起步将比较语音学材料的对应关系整理成某种体系而言，因为正是这些比较语音学的材料由于显示出它们合乎规律的性质，因而使我们能够构拟一个假定的共同阿尔泰语的语音结构图作为进一步探索的起点。此外，学者的人数，包括在这一领域中作出过最初贡献的学者，以及在已取得的积极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在这方面深入钻研的学者，也不足 10 人。而与此同时，阿尔泰语言世界，就列入其中的独立的语言及其语族而论，则是十分宽广的；同样，这些语言的发展历程以及它们相互接触和与其他语言的互相影响的历史，也是十分复杂的。

我们并不追求确立一些无所不包的理论前提，而是只想依据我们在阿尔泰语言比较词汇学领域中点滴的工作经验，交流我们的某些看法和论断。

例如，在分析词汇的题类时可以发现，虽然在语义方面经常是分歧的，但是其显示一般与个别、类与种、这一变种与另一变种的标志却是互相关联着的。这种没有直线的语义一致的情况，甚至在近支亲属语言范围内也可以看到。我曾举满通古斯语中表示“鱼”（总称）这一概念的名称作为很有代表性的一个例证，满通古斯语族中共使用三个不同的词。^②

（1）在北部（西伯利亚）语支中，使用一个起源于原始形式 *кол (*о*) -co 的名称：埃文基语 олло ~ олдо ~ олро，埃文尼语 олра ~ олда ~ олла，涅吉达尔语 оло (< *олло) “鱼”（总称），而在南部（黑龙江）语支中，则在语音上有规律地与乌德语 олоно，以及那乃语、乌里奇语、奥罗克语 холмо (н-) 相对应，但却是另一种意思——“煮的鱼”。试再比较蒙古语 холис

^① В. И. 阿巴耶夫、Б. В. 果尔龙格、М. М. 古赫曼及 П. С. 库兹涅佐夫编著《印欧语历史比较研究的方法问题》，莫斯科，1956，第 39 页。

^② 清其乌斯著《关于阿尔泰语言的某些词汇模式》，载于《语言的共性和语言学的类型学》论文集，莫斯科，1969。

“鱼皮衣”。

(2) 在南部(黑龙江)语支中, 鱼这一名称(总称)的原始形式起源于另一词根词——*сугъан (а)-са: 那乃语 *согдама*, 乌里奇语 *сугдама*, 奥罗克语 *сун-дамма*, 奥罗奇语 *сүгъаса ~ сүгъаха*, 乌德语 *сүгъехä*。此词在北部语支诸语言中也都有, 但只表示一类变种——“淡水鲑”或“细鳞鱼”, 试比较: 埃文基语 *сүгъанна ~ сүгъанда ~ сугданра*, 埃文尼语 *хуъанра ~ хуъанда ~ хуъанна*, 涅吉达尔语 *согъана (< *сүгъанна)*。

(3) 满语中鱼的总称是独特的, 称之为 *ни-ма-ха*, 试比较女真语 *li-wah-hah* 和比金那乃语 *иماха* < 满语; 但是, 那乃语为 *нимо* “细鳞鱼”。

我们注意到一个有趣的情况: 虽然上面列举的所有这些满通古斯语中的鱼的名称具有不同的词根, 但是它们在形态学方面却属同一类型, 因为全都是用总体—集合构形成分—*-са, -сэ, -со (在同化形式中为*-л-са > -лра ~ -лда ~ -лла 或 *-н-са > -нра ~ -нда ~ -нна) 构成的, 满语-ха。至于蒙古和突厥诸语言中鱼的名称(总称), 则它们彼此之间是不一致的, 而且也不同于刚才所引述的三种满通古斯语名称中的任何一种。但是其结构则和满通古斯语的结构一样, 也可以把这些词归入总体—集合意义的名词一类: 蒙古书面语 *žiγa-sun*, 古突厥语 *ba-liq* “鱼”(总称)。后一情况证实词的阿尔泰模式存在的共同性。因此, 根据分题别类对阿尔泰诸语言中鱼的名称进行的探讨, 我们可以注意到, 譬如说: 眼前就有的两三个相当重要的事实。第一, 所指出的突厥语、蒙古语和满通古斯语中的不一致之处, 并不能成为反对这些语言在起源上具有亲缘关系的证据, 因为甚至是在亲缘关系无可争议的满通古斯语中, 这一名称也表现为三个不同的词位(而且这些语言的划分与它们在历史上的相互关系和地理分布是一致的)。第二, 上面列述的五个名称, 正如我们所查明的那样, 结构上都属同一类型, 而这一点, 已经是对上述名词的语源所作出的一个小小的贡献了, 因为这一情况使得研究者能够把这些词分解成为单个的词素。第三, 或许还应当寻思一下, 为什么在阿尔泰语言中鱼的这些名称都属于有总体—集合语义的名词之列。

这样, 我们就得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结论, 即: 对词汇材料进行的分题别类的深入研究, 必须与语义—形态的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 也就是不仅仅像刚才所做的那样, 只在比较类型学方面进行分题别类的整理。必须仔细查看各个语群中每一语言的同根词的整个词族, 以便在进一步进行的比较词汇学研究时, 考虑到从这种查看中所得出的结论。查明词族里所有的

词，对于从相对时间的角度来正确评价我们感兴趣的词的形态外貌是必不可少的，也就是从可否将其上溯到共同源语的原始形式，或反之，将这一形式确定为某些语言中较晚期发展的角度来评价。除此而外，比较词族研究还可以有助于揭示某个词是否是借词或双式词（次生借词），等等。对于词根及其派生成分的构词潜力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其重要程度并不稍低——这可以使我们判断出该词族以及该词族所特有的词义组合（词义束）在语义的延续发展方面的广泛程度，也可以判断出该词族在同义词方面与其他词族的各种关系。最后，用这种方式揭示语义发展的基本趋势和发展的方向，也并非是不重要的。而这最后一种情况又使得我们有可能发现稳固的词汇模式。

因此，对阿尔泰诸语言的词汇进行比较（或者更确切些说，是历史比较）研究，必然要走向词源的问题，因为语言学这两个学科的研究对象是共同的——研究词的发展过程。但是，应当指出，在历史比较词汇学（这是一方面）和词源学（另一方面）的宗旨上，以及在它们彼此间的相互关系和最终的研究目的方面，显示出的观点看法几乎都是相反的见解。^① 在评述苏联 50 年来历史比较语言学成就的文章中已经指出：“对比较词汇学的问题研究得很少。在现代科学水平上，在历史比较词汇学还属于有待填补的研究领域时……或许可以说是关于词源问题的研究；但是，有关印欧语系诸语言间词源关系的研究专著，如果不把论述个别一些词的几篇文章计算在内的话，那么基本上是不曾有过”。^②

在这方面恰当的提法将是：从对阿尔泰诸语言进行词汇比较研究的经验来看，对于印欧语词源学家们在其研究著作中所确定的方向应当予以同意。例如在词源研究的方法，特别是构拟的原则方面，H. I. 托尔斯托依^③提出的微观领域分析法以及 B. A. 梅尔库洛娃在其一些论文中所阐述的论点都受到了很大的注意，特别是下列一些论点（着重点均为笔者所加）：“对一定词群进行的词源分析以其研究方法是根据该词群的结构特点而不同于对另一词群的词源分析……每一个这样的词群的特点也就是该词群的每个

^① 见语言文学部词典委员会于 1961 年 6 月召开的关于历史比较词汇学问题的第 7 次全会上 B. B. 果尔龙格的报告提纲《历史比较词汇学的原则和任务及“语言的词汇系统”问题》；A. N. 契科巴娃的报告提纲《关于词源词典与比较词典的关系问题》。

^② И. М. 特龙斯基：《历史比较研究》，载《苏联语言学的理论问题》论文集，莫斯科，1968，第 24 页。

^③ Н. И. 托尔斯托依：《斯拉夫语词汇类型学的若干经验》，载《语言学问题》1963 年第 1 期，第 29~45 页。

词不断重复的、稳固的、典型的词源证明。”^① 试请参照：“对一个词群范围内的规律性的揭示，如果证明并非偶然性的，而确是名称的典型性，则这种揭示往往可以用于检验词语来源的正确性。”^② 请再参照：“在词源学中，作为论证的方法既经常从形式方面进行类推，也经常从语义方面来类推。从语义学观点看，这是固定语义转用的类推。”^③

下面我们试以阿尔泰诸语言的材料来说明，比如在分析鸟的名称时，是怎样运用语义类推的。

在满通古斯语的北部次语支中，我们可以见到一种相当有说服力的情况。在该语支中，鸟类的总称无疑可以包括在一个带有动词词根“飞”的词族之内：埃文基语、埃文尼语、索伦语、涅吉达尔语 *дэγ-* (u) - ~ *дэг-* (u) - < **дэги-* “飞” —— *дэгү* ~ *дэгү* “鸟”。^④ 在这种情况下，名词 *дэгү* “鸟”不同于动词词干 *дэги-* “飞”之处，仅在于第二音节元音的长度^⑤，并且看来在历史上它大概是一个带“飞翔的”、“正在飞的那个”这一含义的形动词形式或是带这一含义的由动词而来的物体静词的形式，试比较埃文基语、埃文尼语 *тэт* (u) —— “穿、戴”，“身着” —— *тэтү* “衣服”，“穿、戴上的那个”，*дас* (u) - ~ *дан* (u) - “罩上”，“盖上” —— *дасү* ~ *данү* “盖子”，“罩子”，“罩的那个东西”，“盖的那个东西”，埃文尼语 *дур-* “燃烧” —— *дурү* “火灾”，“野火”。^⑥

运用其他语言的材料同样可以追溯出“鸟” ~ “飞着的”这个词的相似的词源，例如，雅库特语 *köt* “飞” —— *kötöp* “鸟”，*kötöp kül* (对偶词) “鸟”，“鸟类”，直译为“飞的野兽”，“飞的生物”，尼福赫语 *nbš-на* “鸟”，直译为“飞的野兽” (来自 *nbš-əb* “飞”，*на* “兽”)，楚瓦什语

^① B. A. 梅尔库洛娃：《关于植物名称词源研究的某些原则》，载《词源学》论文集，1964，莫斯科，1965，第72页。

^② B. A. 梅尔库洛娃：《关于植物名称词源研究的某些原则》，载《词源学》论文集，1964，莫斯科，1965，第74页。

^③ B. A. 梅尔库洛娃：《关于植物名称词源研究的某些原则》，载《词源学》论文集，1964，莫斯科，1965，第81页。

^④ 参看 B. И. 清其乌斯著《论满通古斯语基本词汇的比较研究》，载《列宁格勒师范学院学报》第101卷，1954，第12页。

^⑤ 参看 B. И. 清其乌斯著《论满通古斯语中有关“人民”这一概念的名称》，载《东方学报》，匈牙利，第15卷，第1~3分册，布达佩斯，1962，第43页。

^⑥ 应当说，在上述满通古斯诸语言中现在时形动词的现代形式是借助于后缀-*pū* ~ *mū* ~ *cū* 等构成的；埃文基语 *əər-pū*，埃文尼语 *əər-cū* “飞的”，埃文基语、埃文尼语 *məm-mū* “穿戴上…的”，埃文基语 *əac-mū*，埃文尼语 *əac-cū* ~ *əah-pū* “盖上…的”，*əyp-pū* “燃烧着的”。

beçen kačak “鸟” (beç-“飞”, kačak “野兽”) 这一词组中的 kačak。^①

与此同时, 我们应当指出的是, 例如, 在满语以及蒙古诸语言中, 来自类似的动词“飞”, “飞起”的名词性形式具有另一种意义色彩: 满语 дэйэ- < *дэги-“飞” —— дэйэрэ гасхя “飞的鸟” ~ “鸟类”, 蒙古书面语 degde-, 蒙古语、布里雅特语 дэгдэ-“飞起” —— 蒙古书面语 degde-gekei, 蒙古语 дэгдээхий, 布里亚特语 дэгдээхэй “雏”(羽毛已丰能自立的), 蒙古语 дэгдэнэ “雏”(雌鹤鹑)。

在利用我们所揭示的“飞”>“飞着的”>“鸟”这一模式之后, 我们决定用我们所熟悉的满通古斯语材料中其他的鸟的名称来对这一模式进行验证, 并得出了下述结论: 可能另有两个名称也存在类似的词源, 不同之处在于蒙古诸语言里显现为动词词干, 而在满通古斯诸语言里则由这些词干派生出鸟的名称。可以列入这里来的, 我们认为, 首先是蒙古书面语 nis-, 蒙古语 нисэ-, 布里亚特语 нии-дэ- < *нү-сэ “飞” 和下列满通古斯语的鸟名: 埃文基语 нү-kū, нү-kū-цэн (指小), 埃文尼语 н“е-kū, н“е-kū-цэн (指小), 涅吉达尔语 нē-kū-цэн, 满语 н’э-хэ < *н’ү-кэи “鸭”、“雁”, 那乃语 н’э-чэ (н-), 奥罗克语 н’э-чэ (н-) < *н’ү (к) ѫ-цэн “小鸟”、“鸟儿”、“鸣禽”。在满通古斯语名词 нү-kū 的形态结构方面, 应当指出, -kū < *-кэи 一般乃是鸟兽名称所特有的后缀 (试比较, 例如埃文基语 тура-kū “乌鸦”, сула-kū “狐”); 然而, 如果考虑到这个后缀的原始形式-kū < *-kai, -kei^②, 那么就完全可以把它比拟为, 或者更正确些说是等同于蒙古语的后缀-yai, -gei, -xai, -kei < *-kai-, kei-, 而蒙古诸语言里则是运用这一后缀由动词词干构成因行为的结果从而具有性质意义的名词。^③ 因此, 满通古斯语的 н’ү-kū < *н’ү-кэи “鸭”、“野鸟”、“鸟儿”, 虽然我们分析为来自动词 *н’ү-сэ-“飞”的名词构成, 而且确定它与“飞的”~“会飞的”, 或

^① 楚瓦什语 kačak 在语义上相当近似于雅库特语 kūл “野兽”、“野味”、“野禽野兽”、“野鹿”、“驼鹿”、“生物”、“工具”、“物品”、“东西”。有趣的是在其他突厥语中也有一些在语义上与楚瓦什语 kačak “野的”、“鸟”并行的词, 即: 古突厥语 keðik ~ kejik “鹿”、“扁角鹿”、“兽(概称)”、“野的”, 土耳其语 geyik “鹿”、“扁角鹿”, 巴什基尔语 keñek “兽”、“野生动物”, 马其顿语 kuek “野味”、“野的”、“兽”(野生的, 有捕猎价值的), 旧时原指“鹿”、“高鼻羚羊”、“麇子”, 现已不用, 阿尔泰语 kučuk “野兽”, 土库曼语 keňuk “瞪羚”、“黄羊”。突厥语的并行词请参看耶果洛夫的著作第 85 页。

^② 关于满通古斯语中与词末 ū < *-eи ~ -ai 等相对应的成分可参看清其乌斯著《语音学》第 102、104 页。

^③ 关于蒙古语后缀-yai ~ -gei // -xai ~ -kei 的意义请参见 H. H. 波普著《蒙古书面语语法》, 莫斯科, 1937, 第 102 页。

者也许是“随季节迁徙的”同源，然而其形态结构则完全类似于蒙古书面语中由 degdege-“飞起”、“升起”而来的 degdege-kei“雏鸟”，直译为“飞起来的”～“正在飞起来的”。

下一个乃是早已引起我们注意的对于“雁”的一个独特的名称，即埃文尼语的 ēрбēч。这一名称仅在不久前才找到它的对应词，即东埃文基语的 īрбāм 和上涅吉达尔语的 ёрбāм дэгү (对偶词)“候鸟”。我们认为可以把它与下列蒙古语的一些动词形式和名词形式相提并论：蒙古书面语 erbe-lež-，蒙古语 эрбэ-лзэ，эрбэн дэрбэн мисэ-“飞来飞去”，布里亚特语 эрбэ-зэ-нэ-，эрбэ-лзэ-“旋转”、“搔首弄姿”，蒙古书面语 erbe-kei，蒙古语 эрбээ-хий，布里亚特语 эрбээ-хэй，卡尔梅克语 erш ēкē，土族语 xalierge“蝴蝶”，布里亚特语 hapbhan эрбээхэй“蝙蝠”，直译为“带蹼的飞蛾”。诚然，在中期蒙古语文献中有些词首为 h (以及土族语中词首为 x-) 的形式，从而使我们可以给蒙古诸语言确定一个原始形式^①*perbege-kei > *herbege-kei > 中期蒙古语 herbēgei，蒙古书面语 erbē-kei“蝴蝶”(直译为“飞来飞去的”——带后缀-kei 的动名词，见上文)。这样一来，埃文尼语的 ēрбēч < *эрбээччу “雁”由于其形式中并未反映有词首“h”，所以应当将它看做是借词，而且显然是一个相当古老的借词，因为埃文尼人在现代与操蒙古语的民族并没有直接的交往。^②无论如何，这最后一种情况同前面所分析的两种情况一样，也让我们能够说，满通古斯诸语言中鸟的名称与飞这一概念是有密切联系的。“飞”>“飞着的”>“鸟”这样一种意义上的规定序列并非阿尔泰诸语言表达“鸟”这一概念唯一可以实现的方法，对于这些语言来说，用对偶词来表达“鸟类”这一总括性的概念也是很有代表性的。满语 гасхা үэцукэ “鸟 + 小鸟儿” = “鸟”(总称)^③，布里亚特语 шүбүү шонхор “鸟 + 鹰” = “鸟”，古突厥语 quš quzγun “鸟 + 鸦的” = “鸟”、“各种鸟”，雅库特语 kyc xāc “鸭 + 鹅” = “鸟”。此外，在鸟的名

^① 请参见 N. 波普著《蒙古语比较研究引论》，《芬兰—乌戈尔学会论文集》第 110 期 (1955 年)，第 46、92 页。

^② 因为蒙古语中有一个动词 * perbege-“飞来飞去”，所以指出下述情况也是颇为有趣的，即，许多语言中有一些形象词，而其发音则与这个动词的第一音节相似，试比较满语 Фэр сэмэ “轻率地”、“欠考虑地”，Фэр Фар сэмэ ээнэ-“飞来飞去”(指蝴蝶，鸟)；尼福赫语 пар-пар пынəб，巴什基尔语 пыр-пыр осо-，鞑靼语 пыр-пыр оч-，прылæа-“飞来飞去”。

^③ 在鸟的总的类称方面，对满通古斯语材料首先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这里鸟类至少又可分为两类——大的、有捕猎价值的鸟(野禽)和小的鸣禽。